

歷史問題論叢

翦伯贊著

翦伯贊著

歷史問題論叢

(增訂本)

人民出版社

历史問題論丛

(增訂本)

翦伯赞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7}{8}$ 插页2 字数298,000

1962年2月新1版

196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六)1.50元

统一书号 11001·193

目 录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1
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8
从学术自由谈起.....	16
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綫的斗争.....	32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問題.....	42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問題.....	51
談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結合問題.....	68
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談到古籍整理問題.....	73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79
論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92
《义和团》序言.....	107
論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110
再論中国历史研究.....	123
关于历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	130
写在《史学周刊》一百期之后.....	142
《戊戌变法》序言.....	145

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問題.....	149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178
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国社会經濟的性质.....	188
釋《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	253
《历代各族傳記会編》序言.....	276
义和团运动.....	280
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	304
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	318
跋《宋司馬光通鑑稿》.....	326
为《通鑑》编写分工問題釋疑.....	333
《琵琶記》的历史背景.....	344
讀郑振鐸《关汉卿戏曲集·序言》.....	353
應該替曹操恢复名誉.....	359
評越劇《則天皇帝》.....	370
文成公主說了話.....	376
給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	384
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說到昭君出塞.....	394
后 記.....	409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解放以来，我国科学家、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些科学家、教授通过自己的那门科学的研究，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科学家、教授已经初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教学和科学的研究工作。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我国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领域中建立了统治地位。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目前中国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从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彻底地消灭，那就是过于乐观。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文化科学的领域内留下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有些人在政治上接受了社会主义，而在思想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抵触，还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正像政治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上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思想战线上的谁胜谁负的斗争，毛主席说：“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来，特别是整党开始以后，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平行，在思想战线上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很懂得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挖心的战术，是要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

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右派分子费孝通所写的一篇文章，《知

識分子的早春天气》。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极其刻薄的言詞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誹謗。他认为解放以来，我們对于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有一套簡單的邏輯，即：苏联的科学都是唯物論，資本主义国家的科学都是唯心論。他用舞台的臉譜来諷刺我們对待唯物与唯心的态度。他把唯物論比作“紅臉”，唯心論比作“白臉”。他认为我們划分唯物与唯心，就“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是白臉还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他說他和他的朋友是看得懂剧情的，因而他們对于“白臉”挨打是不能心服的。

为了伪装自己，費孝通說：他和他的朋友曾經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們把心爱的英美书从书架上抽掉，換上一些从俄文翻譯出来的小册子，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唯物論者。在讲堂讲課的时候，也引几句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中的話，欺騙学生，如有必要，并罵一罵他們亲爱的英美同道，表示进步。总而言之，他們曾經努力掩盖自己臉上的白粉，塗上一些胭脂，可惜化裝的技术不高明，在鼻子上露出了白粉，終于現出了原形。

費孝通不仅用“紅臉”“白臉”來詆毀馬克思主义，打击人們学习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还动员他的朋友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等出来和馬克思主义者“打官司”，要他的朋友利用百家爭鳴的机会，控訴馬克思主义，替唯心論伸冤。他还說：“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要問个明白：“唯心的为什么不对？”

費孝通用先发制人的战略来展开他們对馬克思主义的进攻，要馬克思主义者望着唯心論泛濫，望着資产阶级思想冒头，而不应有任何警惕，当然更不应进行反批判。他說：你們“聞到一些唯心論的氣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濫了，資产阶级思想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压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搗乱人間的样子”。

不許反批評是办不到的。在百家爭鳴中，馬克思主義当然要鳴。聞到了唯心論的氣味，當然要敲警鐘，不仅要打起警鐘，還要對那些從陰沟里冒出頭來的那些東西，予以迎头痛擊。至于說什麼妖魔要從石碣底下攢出來，我們並不害怕。我們見過不少妖魔，也捉過不少妖魔，像費孝通這樣小小的妖魔，即使從石碣底下衝出來，我們還招架得住。你們衝吧，搗亂吧！看你們衝到哪里去，搗些什么亂。

費孝通的《早春天气》是章羅聯盟用來動員反馬克思主義力量的一個宣傳文件。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各種各樣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就愈來愈猖獗了。我是學歷史的，又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在這裡，不能不提到我的同行雷海宗教授的言論。雷海宗教授在“天津教授們關於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應該看做是在學術思想方面向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公開挑戰：

不過在雷海宗教授的言論中，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輩已經說過的一些陳腐的調子，甚麼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不合國情論等等。應該提到，雷海宗教授也提出一條他認為很新鮮，其實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材料，即一八九〇年在埃及發現的一部殘缺不全的所謂《雅典宪法》。他就想利用這一條材料作為武器來推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某些問題的提法，企圖动摇馬克思主義關於古代史的基本理論，從而把中國的歷史研究拉回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道路。在這裡，我想向雷海宗教授提出一點小小的建議：如果一定要反掉馬克思主義，仅仅依靠這一種材料是十分不夠的。雷海宗教授大概也知道，馬克思仅仅為了寫《資本論》就看了一千五百多種參考書。

至于雷海宗教授所說的，從恩格斯死後，馬克思主義就停止了發展。這種議論不能認為只是他的學術見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

态度。因为这种議論，实际上就是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列寧阶段，否定毛澤东主席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創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紀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新的闡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馬克思主义的胜利。虽然他后来也做了一些辯解，說他的馬克思主义停滞論，只是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但就是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馬克思主义也沒有停止它的发展，列寧的許多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等都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毛澤东主席的許多著作，替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列寧、毛澤东所論述的多是近代史方面的問題，但在这些著作中却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論。虽然他們在論述历史問題的时候，总是結合革命問題，但并不能因为結合了革命就說不是历史科学，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許就是我們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

关于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組的名义提出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郭沫若院长已經作了全面的駁斥，他指出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的駁斥。正因为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所以也就必然是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綱領。應該指出，在这个綱領中，沒有一个地方提到共产党，提到馬克思主义。在这个綱領中提到的是保卫科学家，是取消科学的研究的火車头，是恢复和重視資产阶级的所謂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总起来說这个綱領是企图在組織上取消共产党领导，在思想上取消馬克思主义的领导。显然，这个所謂“意見”书，就是資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篡夺思

想領導权的无可抵賴的供狀。

我們要不要研究社會學呢？我們要研究；但我們所要的並不是替資產階級提供剝削資料的社會學，而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提供資料的社會學。我們要不要政治學和法律學呢？我們要；但我們所要的不是辯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學，而是研究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政治學；不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鎮壓劳动人民的法律學，而是保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鎮壓反革命分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法律學。因此，我們堅決地反對右派分子提出的恢復和重視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學，並且要對於這種反動的企圖予以严厉的駁斥。同時我們還要警告右派分子，在文化科學的領域內，要想搞資產階級的所謂社会科学的復辟，是注定要失敗的。

從費孝通的《早春天气》到以民盟中央科學規劃小組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是最近一個時期反馬克思主義活動的發展經過。當然在這個時期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這裡就不備舉了。現在我還想說到的，是這些反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理由”。

最近時期，几乎所有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都是隱蔽在“反教條主義”的幌子之下進行的。這些人異口同聲地胡說，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要挖教條主義的根，就要挖掉馬克思主義。是的，我們承認在目前的科學研究和教學中，存在着一些教條主義，正因如此，所以共產黨才提出反教條主義的號召；但如果說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那就是胡說。大家都知道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就有教條主義。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有教條主義。中國古代的學者，開口“子曰”，閉口“詩云”，難道不是教條主義？西洋中古時代的學

者，开口“上帝”，閉口“耶穌”，难道不是教条主义？可見教条主义古已有之。当然我們并不因为古已有之，就說不妨今亦有之，教条主义不論古今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應該反对。不过我們反对教条主义和右派分子沒有任何共同之点，我們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发展馬克思主义，我們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右派分子則是为了反垮馬克思主义。

也有些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是隱蔽在強調資料的重要性的幌子之下进行的，好像馬克思主义者都是空談。可惜这种攻击又是无的放矢，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說过資料不重要，相反地，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任何問題都要詳細占有材料；不过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任务停止在資料的罗列，而是要通过对資料的分析、研究，发现問題的本质，发现事物发展的規律，作出創造性的論斷。而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則是企图把科学研究引向煩瑣的資产阶级的研究道路。

还有些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是隱蔽在继承文化傳統的幌子之下进行的，好像馬克思主义者不要文化傳統。实际上，在历史上沒有一个学派像馬克思主义者一样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过我們对待古代文化是要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还要根据革命的實踐加以檢驗。而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则是国粹主义者，在他們的思想中只要是旧的都是好的，新的都是坏的。他們是想利用继承文化傳統来进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

右派分子是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来进攻馬克思主义，但是不論藍衫或紫袍，都不能掩盖他們的反动面貌。我們必須同各种各样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进行斗争。不去和敌对的思想作斗争，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就不能发展，不去毁灭唯心論的堡垒，馬克思

主义就不能巩固它的陣地。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們不仅要从政治的战线上也要从思想战线上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

資產階級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 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於恢復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科學”的陰謀活動，不只限於社會學、經濟學等部分，也包括歷史學在內。我現在就歷史學這方面說幾句話。

解放以來，我國大多數的史學工作者都初步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歷史學觀點，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研究歷史，擁護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還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在不同的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這些人在過去幾年中尚有所顧忌，在章羅聯盟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前后，就明目張膽地發表了各種謬論，並假借學術的名義對共產黨進行政治性的攻擊活動，徹底暴露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歷史學界的右派分子有很多共同點，主要地有下列幾方面：

第一，和其他部門的右派分子一樣，歷史學界的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例如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等都發表了這樣的謬論，他們都是從原則上反對應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歷史。歷史科學是一種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的科學，它和經濟學一樣，它的材料的特殊性質就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階級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辯護歷史家自己所屬的階級的利益。因而在這一方面右派

分子就带着最恶毒的故意，向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疯狂地公开的进攻。他們妄想在历史科学領域中反掉馬克思列宁主义，让資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复辟。

雷海宗用一本所謂《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义停滞論、过时論和不合国情論等等陈腔烂調。他誣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所謂“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說：“整个社会主义陣營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貧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資本主义学术界看来連評論的資格也够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寫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資本主义国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資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陣營的社会科学界來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認識条件和資料条件下对問題所說的个别的語句。”他对于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資产阶级的所謂科学方法。慢說資产阶级已經臨于沒落的時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資产阶级的所謂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駄馬，面临本质与現象，結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說这匹“笨重的駄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話。

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問題，来进行攻击。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問題，資本主义萌芽問題，农民战争

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汉民族形成問題。應該指出，向达提出的五朵花的問題，是不符合事实的。解放以来我們是着重地討論了这五个問題，討論这五个問題并沒有錯，因為它們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問題。除此以外，在历史学方面我們还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其中有大問題，也有小問題。然而向达就只看到这五个問題，用他的話說，只看到这“五朵花”，而且最討厭这五朵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正因为如此，向达就不高兴，到处宣传，好像这就是解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罪状。向达不仅反对用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而且十分輕蔑馬克思主义。湯用彤先生在他的著作《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重版时作了一个后記，里面說到“試圖用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就說：“这是降低身分”。显然照他看来，只有坚持資产阶级的立場、观点才是高人一等。

如果说雷海宗和向达是站在資产阶级的立場上来反对馬克思主义，企图用买办阶级的和資产阶级的历史学来代替馬克思主义，荣孟源則主張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荣孟源在他的《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資料》一文的初稿中，充分地暴露了他的这种反动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沒有一个字提到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隱晦的笔調反对馬克思主义。他說：“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資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議的論文。論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論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从前后文看来，荣孟源所謂的論文，就是指的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論文。这种論文，在荣孟源看来，是妨害了历史科学的发展的。他又說：“編年史继承我国的历史傳統，既要直言无隐，又应注意书法，即注意立場、观点和

方法。”

我們从来没有反对过編年史，我们认为編年史虽然也有它的缺点，但仍然是我国史料編纂学中的优良傳統之一，所以解放以后，我們把《資治通鑑》整理出版了。不过用編年体的方法来編排史料，并不排除应用新的立場和观点；反之，应用新的立場和观点来研究历史不是就不能“直言无隱”，然而不难看出，榮孟源是把直言无隱和立場、观点、方法对立起来，好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应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就不能直言无隱，这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种恶毒的污蔑。榮孟源在攻击了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了編撰各种不要馬克思主义或反馬克思主义历史书的建議。按照榮孟源的建議去行事，就必然要使中国的历史学退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

尽管右派分子用玫瑰的顏色来描写資产阶级的乃至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但是要想把中国的历史学拉着倒退是不行的，原因就是时间太迟了。馬克思說过：“同一件东西对某一个世紀是一个完成品，但对另一世紀，只是用到新的生产去的原料而已。”資产阶级的乃至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都有他自己的世紀，它們的世紀已經过去了。因此即使在它們中間有一些有用的部分，也只能作为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原料了。

第二，資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严重右派思想的人不仅反对馬克思主义，也对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向达、雷海宗、榮孟源等都是这样，向达在很多會議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領導大肆攻击。他說科学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說科学院的党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軍閥。向达經常摔紗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議。向达自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所謂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还以老爷自居，叫这个下台，那个下台。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級教授、图书馆館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給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誣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誣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異”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窩”。他恣意挑撥說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他威胁地說：“把我們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們是受气，我要控訴！”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誣蔑“中国知識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領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后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說假話的人，怎么能給学生以正确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話說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談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說，不然，知識分子就要說假話，或者就要采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消极怠工的态度了。

荣孟源也极端仇視我們对資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他在前述文章里，歪曲和捏造了一些党员說的話，然后攻击說，“我认为这說法很无知，可是只能腹誹，不敢說出口来，腹誹应当杀头，但无所表示，他人不知，其奈我何”。他簡直是把共产党员看做封建专制的君主，其心怀仇恨之深是可想而知了。

所有这些都說明了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都是隐蔽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之下，叫着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以便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